

文化景观 (十四)



包拉温都杏林



牛心套保

B 白城记忆

包拉温都杏林风景区

通榆县境西南,一片东西长20余公里连绵起伏的沙丘,生长着100多万株天然次生山杏树,占地面积1万多亩,形成天然奇观——杏花海。这就是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包拉温都蒙古族乡杏林。

仲春时节,放眼望去,杏花竟放,漫山遍野,无际无涯。随着沙丘的起伏,层层叠叠通向天际,置身于杏树林中,馥郁的花香沁人心脾。

待到初夏,杏花已谢落,继之而来的是纽扣大小的青杏,密密匝匝,隐藏在紫枝绿叶中间。七八月间,是杏核成熟的季节,每年这里都向国家交售几万斤杏核。

冬季,一株株树干变成了紫色,裸露出晶莹闪亮的身躯,携手连片,把这里覆盖成一片闪亮的紫色。难怪蒙古族人称这里为“紫色的山冈”(即蒙语“包拉温都”)。

牛心套保景区

牛心套保位于大安市西南部,方圆近7000公顷。南面是国营沟林场的稻沼

林海,东面、北面包围在姜家甸大草原中。“套保”,蒙语,连绵的土包子、土岗子的意思;“牛心”,意思是牛的心脏。合起来说,就是状如牛心的土山,是用来形容包子中间那座最大的土山的,所以名为牛心套保泡。牛心套保村口有两棵大树,人们一直奉若神灵,认为它保佑了一方百姓的平安,称其为“夫妻树”。这两棵树是蒙古榆。从外貌上看,也不甚雄伟高大,但形态奇特,两树的根茎挨在一起,当地人都说这两棵树是一对青年男女幻化的。

牛心套保芦苇资源丰富,面积竟达3500公顷之多,被称为“苇海”。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国营苇场,对芦苇进行科学的种植、养护、改良,在苇场建立了大量沟、渠、闸、涵,打了深水井,增强了抗旱排涝能力。连续几年,芦苇产量都在万吨以上。

牛心套保属草原湿地,泡沼、苇塘、沙丘、灌丛、天然次生林和面积人工林为鸟类提供了优越的觅食、隐匿、繁殖的条件,因此鸟类很多。这里有蒙古兔、黄鼬、赤狐、狼、貂、獾等兽类四目八科十二种。牛心套保又是鸟类的天堂,丹顶鹤、蓑衣鹤、大鸨、野鸭等40多种在此栖息。

(白城市文联供稿)

责任刻在城墙上

●公道北



清凉门是明南京城内城十三座城门之一,是研究明南京城墙建设重要实物。(资料图片)

或许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座右铭记忆犹新,又或许是漠北残元铁骑的嘶鸣声依旧刺耳,大明王朝从鼎盛江南之初,便着手在这里修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帝都——南京城。单纯从建筑角度来看,明朝南京城“高筑墙”是卓有成效的,历经650余年的风雨战火,至今依然屹立不倒,长达25.1公里的明城墙得以保存下来。南京明城墙被称为“世界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墙”。

主要是因为城墙砖又多又好。

先说“多”,明朝修建南京城墙用了多少块砖?学者们作了估算,有的估计是1亿块砖,有的估计是3.5亿块砖。可以参照同一朝代的保定城墙推测。保定城墙长12里,也没有南京城高大。据史书记载,修建保定城已然耗费砖石数百万块。而南京城作为明初帝都,号称96里长,不少地段高度达20余米,厚度达5米,所费砖石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动用大明王朝1部、3卫、5省、37府、162州县的人力物力,数十万民工修了整整28年,耗尽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生命,才基本把这座南京城修完。这一浩大工程也是以明朝开国之初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到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崇祯两朝,几度想修补一下单薄的北京“京师外城”,都限于人力、财力、物力没能实现。

再说“好”,明城墙的砖块均由长江中下游沿江州县烧制,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广大区域。烧制区域虽广,但规格和质量基本整齐划一。绝大部分砖块的尺寸是厚10厘米、宽20厘米、长40厘米,质量则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属于古代砖料的上乘之作。特别是产自江西的白色砖石,系用高岭土烧制,质地细密坚实,硬度坚如磐石,更是被称为“珍品”。这也使得明朝南京城成为一座雄伟坚城。16世纪,利玛窦来到南京城,被南京城“城墙之高”所震撼。他形象地记录道:“两个在城墙上骑马一大早从同一个城门往相反的方向奔驰,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能碰面。”

明城墙砖石的“保质期”也很长。

直到1659年,南明郑成功北伐、围困南京,结果被明朝自己的雄伟城墙“折服”了。那些城墙在建造300年后依然高大坚固,他的优势兵力在城墙面前毫无用处,最终望城兴叹、铩羽而归。后来,太平天国从明城墙上拆掉了不少砖,用于修建天王府。直到1937年南京保卫战,南京明城墙还用自己古老的身躯,抵挡着日本侵略军的猛烈炮火,最后一次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

明城墙砖质量之好,可见一斑。

古代城砖烧制工序繁多,选土、沥浆、制坯、晾坯、装窑、烧窑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一点差错,都会功亏一篑,而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的一个中型砖窑就有88名工匠,这么多人经手,如何保证城砖质量呢?

答案就是“勒名”制度。

南京市明城墙遗址博物馆编撰的《南京城墙砖文》收录了大量城砖铭文,随手举一块编号为0705的城砖为例:“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勤、司吏徐用、武昌县提调官县丞杨时敬、司吏黄景、总甲刑仁、甲首熊祥、小甲王珣、窑匠袁兴、造砖人夫占均美。”52个字,9个人名。这九人就是负责烧制这块砖的府县里甲各级官员、监工、工匠的名单。有意思的是,这块砖上的“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勤”还出现在南京的另一个地方。1980年,黄裳写下游记散文《重过鸡鸣寺》,在寺中“翻回去看那路面铺着的古砖”,他仔细观照,发现“砖上写着‘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勤……’字样。”这些古砖在清末民初被从城墙上拆下来,用于铺设路面,被踩踏数十年,字迹犹能辨认,生命力何其顽强。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如果哪块砖的质量出了问题,砖上留名的相关人员都会被问责,轻则责令重新烧制,重则被罢官流放甚至杀头。

所以,砖上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责任。如此一来,哪个官员敢不尽心尽力?

德化瓷器行销天下

●王澜

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是元朝泉州的德化白瓷,目前依然存放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内。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的“乳白似象牙”的“中国白”,则是法国人对明代中晚期德化窑烧制的白瓷的专有称谓。

中国瓷器大规模外销始于唐、五代时期,主要为越窑、长沙窑、巩县窑、邢窑产品。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航路的拓展,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北方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南方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产品都有外销,但多数窑口距离海港路途遥远,运输成本以及损耗率居高不下,难以规模,而泉州所管辖的德化、晋江、南安等地区,多山丘陵,林木茂密,溪流纵横,瓷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畅达,具备制瓷工业发展的所有必要条件。为满足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巨大需求,宋元时期泉州所管辖的地方开始设置大量仿烧越窑、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专供外销。

构成泉州港这一世界遗产的22处遗产点中,德化窑的屈斗宫遗址和尾林一内坂遗址位列其中,它们正是泉州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的主要产品瓷器生产的杰出代表。

屈斗宫窑址位于德化县龙浔镇,由福建省博物院联合厦门大学、原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于1976年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发掘出分室龙窑一座,填补了德化窑发展历史的一个空白,是研究中国古代南方窑炉技术体系重要的考古资料之一。分

室龙窑在当地称为“鸡笼窑”,是龙窑向阶级窑过渡类型,具有容易控制火焰气氛、节约燃料等特点。所发掘出土器物标本近7000件,皆为宋元时期的白釉和青白釉器,胎质洁白精致,白釉细腻温润,青白釉呈水青色,釉厚处呈淡绿色,玻璃质感强。

尾林一内坂窑址位于德化县三班镇。2020年3月至6月,福建省博物院联合德化县陶瓷博物馆、厦门大学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5座窑炉遗迹,出土宋至清代青白瓷、白瓷、青花瓷标本数千件。尤其是首次在一个遗址中发现四座分属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窑址,对应着从龙窑至明清时期的横窑阶级窑的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德化窑古代窑业技术史的缺环。

考古人在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广东“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东南亚等地均发现大量德化窑产品,也从侧面证明德化窑瓷器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品之一。

明代中晚期,随着制瓷和窑炉技术的改进,德化窑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创烧出胎釉浑然一体、釉色如脂如玉的白瓷制品。其中的佛道人物塑像,代表着德化窑的最高制瓷水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座德化窑白釉观音坐像,神态安详自然,衣饰下垂拂流转,栩栩如生,望之顿生庄严肃穆之感。

至清代,德化窑除继续生产白瓷外,还根据海内外市场需求,生产青花瓷和彩瓷,且青花瓷渐成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化窑从一开始的自给自足模式到宋元时期为了适应海外市场需求而进行主动调整,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重要陶瓷生产基地。明清两代又因海禁等原因,转为“内外销并重”的生产销售模式。

德化窑对海外世界的影响时间久、范围广。在欧洲,德化瓷引发了当地的厨房革命,所生产的杯、碗等,替代了原有的金属餐具,甚至引发了仿制德化瓷的热潮。后来,欧洲发明的第一件硬质瓷,模仿的样本就是中国德化白瓷。



图为德化窑青白釉小盒。

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范小倩

暑假,是青少年与电子设备“亲密接触”的高峰期,这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游戏,或受到网络“三俗”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担心并不多余,青少年媒介使用技术娴熟,但媒介素养有待提升,容易受到网络“三俗”侵蚀。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选择和理解的能力、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创造和生产的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等。这在新媒体海量信息时代尤为重要。要提高青少年网民的媒介素养,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媒体—社会”立体参与,其中尤其要重视以下几点:

价值引领是首位。媒介素养强调的是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那么以什么尺度去分辨和解读呢?先进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度量信息的尺子。有的青少年容易受到“三俗”影响,其根源在于心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帮助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使他们拥有度量信息的尺子。要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用他们喜欢和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就像《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那样,在潜移默化中讲述党的初心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

人文教育是奠基石。如果人文精神缺失,一些年轻人就容易陷入空虚和迷茫,让网络“三俗”钻了空子。无论教育处于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模式,都应该充分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仅从实用和技术层面来谈人文学科是目光短浅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塑造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培养其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而这正是良好媒介素养的必备根基。

父母是第一影响人。如果年轻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手机、刷视频,很难想象孩子能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由于父母的引导方式不同,使得孩子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偏向学习信息,有的偏向娱乐消遣。一样的屏幕和键盘,由于父母媒介素养的不同,让孩子走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父母的陪伴、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以身作则,能使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团体可为助力者。社会团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过程中可起着重要作用,鼓励和提倡社会团体举办丰富多彩的媒介素养实践活动,以游戏、竞技、趣味的方式来进行训练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之成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已是当务之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只要政府与学校、家庭与社会团体携起手来,就一定能让青少年在面对网络信息的海洋时明辨是非,健康成长。

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三、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

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全党对“左”的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举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虽引起一些人议论纷纷,却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动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38)